

十五十六世纪 日本社会经济史论

童云扬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十五十六世纪 日本社会经济史论

童云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五十六世纪日本社会经济史论/童云扬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307-10157-9

I. 十… II. 童… III. 经济史—研究—日本—15 世纪~16 世纪
IV. F131.3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6139 号

责任编辑:李 程

责任校对:刘 欣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08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157-9/F · 1719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20 世纪 70 年代，武汉大学历史系新成立“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我作为研究室的第一批成员，参加主持了这个研究室的工作，担当起对这个时期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任务。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吴于廑教授提出从世界全局的视野出发，用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和讲授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的思想。多年来，我都是力图用这个想法来对待这个时期的日本社会经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讲课和撰写论文的工作中，感到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易于在实践中发现新的问题，也易于打开解决问题的新思路，陆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十五十六世纪日本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文章，现在，想把这些论文汇集成册，借以表达曾指引我走入日本史学领域的杜宾斯基、井上清、安田元久、周一良、陈尧臣等已故的老师们的感激和眷念之情。

西欧历史上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大转折的上限是十五十六世纪，大体相当于日本的室町（1338—1573 年）后期和战国（1467—1573 年）时代，下限当结束于 1878 年的明治维新，因为直到明治维新才能看到日本由农本而重商、由自给的传统农业社会而市场经济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主要历史著作，多把织田、丰臣、德川时代称为“近世”，“近世”的下限延至明治维新。他们认为近世阶段既不同于封建社会内的“中世”，也不同于明治维新后的“近代”。远山茂树说：“‘近世史’这种时代划分是受了欧洲史学的影响，是从比较史学的观点开始采用的。”所以，他提议：“我们要努力在整个历史的结构中去了解近世社会的本质……不能忽视这过渡期的问题。”要“阐明近世史怎

样从前一时代演变过来，又怎样向下一时代发展……就非常必要了”^①。笔者赞成远山先生的应重视过渡时期的观点。日本在世界进入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大转折后，在先进的畿内地区确有某些类似西欧发展的共同趋势，但在日本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极为落后的广大畿外地区，庄园贵族的权力在走向衰落之时，地头、庄官起家的地方封建领主实力，却正在蓬勃兴起，最后他们联合起来，中断了畿内商品经济自由发展势头，在全日本重新强化了封建统治。但也正因为这种全日本集权统治，克服了长期农民起义和诸侯混战造成的封建危机，给日本带来两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机遇。先是在农本经济的发展上把全日本都提高到进入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大转折的起跑线，使一直反对商品自由发展的德川幕府不能不让位于执行重商政策的明治政权。所以，我认为：日本由农本而重商的过渡，经历了三个回合。近世以前畿内地区的兴衰是第一回合；织田、丰臣、德川的统一及在全日本发展农本经济，是第二回合；然后经过德川幕府直至明治政权成立，在全日本执行日本式的重商政策，才算是结束日本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大转折，是第三回合。我在“绪论”标题上加了一个“日本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大转折的第一个回合”的副标题，就是想进一步阐明日本的近世怎样从前一时代演化过来的问题。

童云扬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于珞珈山

^① 远山茂树等编：《日本史研究入门》中译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63页。

目 录

绪论

——论日本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大转折的第一个回合	1
日本室町时代的“酒屋土仓”和农民运动	18
乐市辨	30
论织田和丰臣政权的乐座政策	50
论织田信长与日本中世末期的统一	66
丰臣秀吉	88
日本畿内型庄园解体过程中的商品经济	94
日本中世商品经济与寄进地型庄园制解体	110
太阁检地与丰臣统一政权	140
日本石高制出现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	168
论日本战国时期贯高制的纳钱年贡	183
再论日本贯高制	194
附录：关于日本中世的农民斗争	216
后 记	227

绪 论

——论日本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大转折 的第一个回合

一、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是世界范围面临由农本而重商的重大转折的历史，是世界各国以不同起点、形式、步骤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在这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亚欧大陆的东端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在西端经历了由农本而重商、由封建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最初历程，开创了西欧走向近代化的新局面。这个时期的日本，似乎也呈现出某些走向近代化的端倪，例如日本此时也处于社会大变动之中，长时期农民运动高涨，中世庄园制度解体，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初步发展，货币租在地租中的比重时有提升，相当程度的资本集中和积累，行会的衰落，海外豪商的出现，自治城市的兴起及统一运动的扩展和统一政权的成立，等等，出现了室町中期以后所谓“市场经济时代”。但是，日本并未从此走向近代化，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势头并没有顺利地继续向前。在织田、丰臣、德川的统一运动时期，他们推行了近两个多世纪的再度强化封建统治的经济政策，只是在发展农本经济的前提下，让作为农本经济补充的商业、手工业有所发展，直到经过江户时代末期的明治维新，才使室町时畿内地区一度出现的商品经济自由发展势头，以室町、德川时代不可比拟的速度在全日本广泛地向前发展。可见，日本在十五十六世纪的世界历史转折时期，虽然开始在一个局部地区似乎基本呈现了与西方相同的发展趋势，但实际的过渡，却经历了与西方不同的长期的曲折过程。如何具体地探究这个过程，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应是这个课题的一项基本任务。

二、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是从室町时代农民运动的性质作用等

问题开始的。^① 因为日本新时代的发端，是以长时期通及畿内、近畿的“德政”农民运动的兴起为标志的。早川二郎说：“新时代的开辟，应始于农民运动的兴起。”^② 这个提法我是同意的。有的学者虽然重视这个时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头，但在评价这个时期与商品经济发展势头有密切关系的农民运动的历史作用方面却相当低估，认为农民运动的矛头不是反对封建领主而是打击商业高利贷资本。我在题为《日本室町时代的“酒屋土仓”和农民运动》的论文中，具体探讨了农民运动反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情况，认为日本当时的商业资本是随着农业、手工业中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有所发展的，但他们当中获得迅速发展的商人上层则主要是凭借封建领主特权而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打击商人高利贷者，首先便是要反对商人上层利用封建特权对农民的残酷盘剥，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商业高利贷资本。从而我提出农民运动反对商人高利贷者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对封建腐朽势力的斗争。同时，我又具体探讨了农民反对商人资本的封建性斗争，不仅有利于减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封建盘剥，也有利于商人高利贷资本自己摆脱封建束缚而获得自由发展的种种表现，如推动商人高利贷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促进海外豪商的活跃和推动自治城市的兴起，等等。这说明，由农本向重商的过渡，在日本，也是以封建统治势力的弱化为前提的。

在农民运动方面还有一篇由我翻译的永原庆二的《关于日本中世的农民斗争》^③ 的译文，发表在1980年我校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主编的《研究资料》第一期上。此文虽然没有具体探讨“德政一揆”的有关情况，没有论及当时农民运动与城市工商业者的相应关系，但他对日本中世农民运动的总体评价作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理论说明。他明确反对日本中世农运“败北论”，认为

① 黑正岩：《日本经济史》国史讲座刊行会，昭和八年版，第244页。

② 早川二郎：《日本历史教程》中译本，第133页。

③ 永原庆二：《日本封建制形成过程的研究》第4部第8章，岩波书店1961年版。

中世农民运动在把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制度推进到“纯粹封建制”的历史新阶段方面是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的，是后来日本能“走上明治维新之路的根本动力”。由于我赞同其在总体上评价日本中世农运的基本见解，故也收入此集。

三、农民运动的冲击，加速了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转折的新进展，在日本历史上确实出现了一些有似西欧但又不同于西欧的某些历史转折时期的新现象。这些现象，主要是当时畿内地区政治生活中逐步扩展的农运中的织田、丰臣、德川的统一运动和统一政权的出现，以及经济生活中标榜自由市场的“乐市政策”与废除商业，手工业行会限制的“乐座政策”的推行；还有在此前就已出现的地租税中有类似货币的贯高制等。关于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我写了《论织田和丰臣政权的乐座政策》^①和《乐市辨》^②两篇论文。

对于学者们颇加好评的“乐座”政策问题，我的见解是：这时的行会组织正处于由封建领主的管理组织向商人、手工业者的自治组织转化的关键时期，对商业、手工业的自由发展正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如重商主义政权，这时是不应该废座而应鼓励支持座的发展。织田、丰臣废座的实质，除具有与庄园领主争夺座的权益的含义外，最主要的在于瓦解商人、手工业者逐步形成的某种更富独立性的具有组织的保证新的经济、政治势力，从而加强对商人手工业者封建性的政治控制。至于意味自由市场政策的“乐市”问题，我认为室町、战国时的“乐市”有两种：一种是农运推动的“乐市”的确展现了促进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趋势，但不久就随着农运失败而衰落；另一种是领主推行的“乐市”，虽然短期发挥了招徕商人、手工业者集居军政据点的作用，但随着领主封建控制的加强和持续扩展，而城下町化了。

① 童云扬：《论织田和丰臣政权的乐座政策》，载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童云扬：《乐市辨》，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总之，从“乐市”的发展历史来考察日本市场和城市的历史变迁，说明正因为“乐座”“乐市”的政策不是重商主义政策，才使一度在先进地区农运发展的城乡出现的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趋势遭受挫折。

还有两篇讨论日本中世较早主要出现于中间边地区有关货币租的文章，即《论日本战国时期贯高制的纳钱年贡》^①及《再论日本贯高制》^②，也有既似象征西欧历史转折的货币租，而实非在西欧实行过的货币租的特点，拟在评论日本中世统一政权结构的阶级实质时一并介绍。

四、关于日本中世纪的统一运动和统一政权的阶级实质和历史作用问题，我写了《论织田信长与日本中世末期的统一》^③与《丰臣秀吉》^④两篇文章。有的学者称，织丰统一政权是“初期绝对主义王权”，认为它等同或类似西欧的王权，具有保护商业、手工业资本的一面。我从统一政权兴起的背景、过程和结果作了考察，提出两点看法：其一，日本中世末期的统一政权的阶级构成不似西欧，不是软弱的王权为了反对地方封建主而与强大的城市势力的结盟，不具有“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性质，没有起到破坏封建等级制和鼓励资产阶级上升的作用。^⑤日本统一政权是强大的地方封建领主在农民运动的巨大威胁

① 童云扬：《论日本战国时期贯高制的纳钱年贡》，载《日本研究》1987年第3期。

② 童云扬：《关于贯高制》，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时改用篇名《再论日本贯高制》。

③ 童云扬：《论织田信长与日本中世末期的统一》，载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历史风云人物评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收录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童云扬：《丰臣秀吉》，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1～342页。

下，联合起来，通过取代腐朽的庄园贵族统治控制城乡新兴的商人、手工业者，组成强大的地域封建制的封建领主联合政权，镇压农民运动，反对一切经济、政治领域中的自由化倾向，重新强化封建统治。因此，日本这时的统一王权的建立，封建庄园贵族是衰落了，但地方封建领主却强大了，它们的封建统治权力还在强化。城市商业、手工业在城下町被迫适应领主需求的条件下虽有所发展，但只能处于传统领主自给经济的补充地位，故得到较大发展的仍是传统的农本经济，或者说仍是传统自给自足经济框架内的市场经济。其二，日本的统一政权和西欧专制主义王权虽然都是在封建庄园制瓦解以后出现的，但西欧庄园制瓦解后一切封建势力在衰落，西欧农本社会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与欧洲不同，日本庄园制瓦解后，伴随中央庄园贵族势力衰落的同时，却有大量曾以各种庄官、地头名义存在的地方封建领主势力在兴起。日本封建制度只是开始由保有大量半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庄园制社会，发展到能摆脱半奴隶制残余的“地域封建制”或“纯粹封建制”的社会，使得此后日本的社会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内。日本与西欧的这种差异，当与日本封建庄园制中畿内型庄园与寄进地型庄园两种庄园形态的并存有关，也与占绝大多数的寄进地型庄园是在封建社会生产力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便提前瓦解的情况有关。说日本庄园制是“提前瓦解”的，有利于说明日本封建庄园制瓦解后，地方封建领主制兴起的必然性和封建幕藩体制还能续存几百年之久的必然性。

《丰臣秀吉》一文与《论织田信长与日本中世末期的统一》一文是姊妹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日本中世末期统一运动和统一政权的阶级构成和历史作用。文章简略叙述了秀吉追随信长及如何继承信长的统一大业，以及建立起独自の全国性统一政权以后，如何对待大名武士、对待农民及对待商业、手工业者的政策措施，从而说明秀吉政权是在封建庄园解体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强有力的领域封建制或“纯粹封建制”的政治代表。秀吉在其十余年时间的全国规模的检地活动中，抛弃了以前各地领主在检地中只解决不同领主集团之间耕地领有权的归属问题，而不切实关注实际耕作者农民土地权益的旧方针。他还顺应因名田经营体制日趋解体而不

断出现的小农自立化的历史趋势，实施“一地一作人”的原则，对包括种种具有半奴隶制残余的“下人”、“所从”等在内的一切农业的劳动者，实行扶持小农自立的政策，在经济上承认小农有永久耕作权，在政治上承认他们有独立地直纳年贡的合法地位，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日本结束了中世以来农民运动长期起伏此起的封建危机，为日本赢得了长期相对和平的发展机会。但是，文章没有指出秀吉在检地中要求各地各级武士集居城下町，确立了兵农分离的原则，必然导致日后出现德川政权的兵农分离、农工商分离、城乡完全对立的局面，预示了日本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必将会经历一个艰苦而曲折的长期历史过程。这一点应是评价秀吉历史功过的一个不足之处。

五、西方庄园制的阶梯，是因为当时的货币地租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使庄园领主与农奴之间的隶属关系转化为货币关系、契约关系，因此封建庄园制就瓦解了。但在日本却不是这样。日本广大的畿内地区在寄进地型庄园解体的战国时期，却到处出现类似过去曾具有一定货币地租含义的“贯高表示”的贯高制。这种贯高制能否视为镰仓中后期贯高表示的延续和扩展，是必须认真加以考察的。为此，我写了《论日本战国时期贯高制的纳钱年贡》和《再论日本贯高制》两篇论文。前文侧重从经济层面探讨贯高制的性质作用，后文侧重在政治层面考察贯高制的实际内容。

前文是按贯高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来探讨的。主要表明：（1）货币地租是以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农村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地区分布上必须经历由点而面的扩展过程，而日本贯高制的出现，只是由依靠军事占领建国的战国大名的一声令下，在全领国全面铺开的。在领国内绝无向商品生产发达地区扩展的过程，更无向领外先进的畿内地区延伸的事实。所以，绝不可能是镰仓中后期的“贯高表示”在新环境下的扩大。（2）从其统一规定的年贡货币量与实物量的比例变化来看，货币量的比例一般先大后小，这显然是由于贯高规定的主观性，完全脱离了农民自给经济生产实际的结果。（3）特别在征收中硬性规定精

钱、恶钱比例，则完全脱离农村、农民的生产实际，纯粹是来自大名欲在领国内获得高级日用品与军需品的主观需求。所以，笔者认为贯高制年贡的出现和普及，并非当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只是战国大名为了强化领国统治而推行的一种临时性财经政策。

《再论日本贯高制》则是沿着战国大名推行贯高制时必须经历的四个步骤来评述的。除了“征收”内容与前文有重复，不拟赘述外，还表明了：其一，检地本是地方领主在庄园解体时蚕食庄园、扩大实力的老办法。这次不同以往的，便是庄园制解体中出现土地权利处于极大细分的时期。大名在全领国检地，便是将领国内的一切土地权利收归大名所有，构成大名单国的强大物质基础，从而不断扩大在领国外的军事占领。于是大名又再检地、再扩大、再检地，周而复始。这里透露出一个新的历史动向，即地方领主是以贯高制的检地为契机，使一个封建割据势力不断自我否定，变成促使日本走向统一的封建势力，可见日本中世后期的统一运动并非始自织田、丰臣、德川。这与西欧当时出现的以民族市场的形成发展为动力的统一运动，不可同日而语。其二，检地之后是折算。检地虽可确定领国内各块田地的面积和田品，但并不能确定其货币价值，大名还必须参照庄园领主原有的年贡总额折算为货币值，再将此年贡总额的货币值落实到每一块土地上去。所以贯高制下的年贡征收，完全不反映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状态，而只是反映战国大名的年贡剥削额绝不能低于庄园制下领主年贡额的决心罢了。其三，折算之后的扣除，乍一看，无非是一些财务细账，其实不然。这个步骤的推行，使领国大名不仅能在全领国建立一支有一定劳动积极性的小农生产队伍，而且还为大名建立了一支颇具组织性的统治农民的军政队伍。因为大名拥有全领国的土地领有权，一方面除为自己留下能压倒群雄的收租权外，还将相当数量的收租权以“思给”的名义分配给领国的大小领主，称为“代官给分”，从而使过去关系松懈的同盟者变为关系紧密的“臣属”。这批“臣属”实际就是变成大名统治全领的文臣武将，使历来领主间的群雄混战大为收敛。另一方面，大名又把全领国的土地耕作权实际上留给了

历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因为检地册上不仅明确记载了他们的租税负担，同时也有在实际上保证了他们的耕作权力的意义。这支巨大的劳动大军虽然受制于一切领主，但从实际劳动条件来说，由于混战局面的结束，耕地年贡的定额化、多层次的领主诛求的取消及领国对农田水利的关注（堤免），等等，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应会有所提升。可见，在世界历史大转折期间，日本后进地区农业大发展的先兆，应是已闪现于战国时代贯高制的推行，而不应总以为是在太阁检地之后。

另外，在贯高制的扣除步骤中应该十分重视的就是在领主家臣团和基本农业劳动者的两大队伍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势力，他们是一群处于领主底层和农民上层的复杂社会势力。因为在庄园制时代“名”体制下的农民都称名主，但名主的大小差别很大。大的名主有“下作人”数以百计，也有役使下人耕作的佃户自己便已是小领主；也有租田给贫困“下作人”的，自己便成小地主；也有招雇工的富裕农民。这些人在领主混战的农民起义的场合有“两栖型”，或追随领主或参与农运。但在这次推行贯高制的扣除步骤中，检地文书表明：战国大名是按他们的不同经济地位给予不同政治待遇（如军役核心的“同心众”、一般军役众、惣百姓），给予不同的优待（如“同心众”全免本年贡和加地子增分，一般军役众不免本年贡，但可全免加地子增分，至于惣百姓则两者都不全免，但可减免加地子增分的60%）。从而把这批“名主”称号下的农村上层收买过去。又通过所谓“寄亲寄子”关系让这批人分别和大名家臣团的上层家臣建立起军事上的指挥和服从关系。这批人散处农村，约占农村人口的两成上下，过去在农民起义中可算是农民之友，现在却完全变成监督、镇压农民的领主爪牙。促成农村政治力量如此深刻变化，当然不能只考察它是某种地租的经济含义。日本中世以来的不同领主集团的长期混战和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而造成的封建危机，战国大名推行贯高制使混战得以终止，农民劳动条件优良改善，必然推动落后地区落后农业的加快发展，从而也让全日本能早日出现由农本而重商历史转折的前景，不能说与贯高制的政治含义无关。永原庆二说：“贯高制是大名为了支配农民以征

收年贡、恩给俸禄以征集兵役两大课题而实行的基本政策。”^① 桑田忠亲说：“贯高制是大名同时推进统治农民、支配家臣……的核心制度。”^② 我看这些话对于从政治层面来评析贯高制是极富启发性的。当然，也应看到，这次封建危机的缓和，虽然有利于农业的复苏和发展，但这种在领主统治处于绝对强势下发展的农业，必然会给推进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转折带来持续的消极影响。

六、日本和西欧都经历了封建庄园制的解体过程，都经历了社会经济由农本向重商的历史大转折，但两地在庄园制解体中的作用彼此不同。其根源当与两地封建庄园制相异有关。这一点引起笔者对日本封建庄园制解体问题的关注。

由于日本封建庄园制是在律令制的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形成的，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由国有土地所有制向私人大土地所有的庄园制的转化过程。在这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出现了阶级构成不同的集中于畿内地区的“畿内型”庄园和广泛散布于广大中间、边远地区的畿外的“寄进地型”庄园。^③

其次，从经济上来看，鉴于西方庄园是在农本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随着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而解体的。所以，笔者也就日本两类庄园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写了有关日本中世“畿内型”庄园解体及“寄进地型”庄园解体的论文。

从政治斗争角度，从庄园农民反庄园领主的斗争和庄园制下不同领主集团之间的斗争方面来探讨日本中世纪庄园制解体的思路，可说是大多数研究此课题的学者们的共识。笔者认为，由于庄园的阶级结构与庄园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同，不能把畿内型庄园与广大中

① 永原庆二：《大名称国制度下的贯高制》，载《战国时代》，吉川弘文馆1978年版，第1页。

②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译本，商务书局1963年版，第450页。

③ 渡边澄夫：《畿内庄园均第名的历史性格》，载《畿内庄园的基础构造》，吉川弘文馆1956年版。

间边远地区的寄进地型庄园等量齐观。如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考察庄园制解体的问题，则畿内庄园制解体与西欧庄园制解体似有易地皆然之慨。因此，在论述畿内型庄园解体一文中，首先考察了畿内庄园在长期持续的农民运动推动下，商品经济在农业手工业中出现走向农本经济对立物的发展趋势，庄园贵族统治权力逐渐衰落和庄园制经济构成逐步变质，促成了畿内型庄园的逐步解体与社会经济地域分工和城乡社会分工的逐步发展，促成农民小商品经济的迅速成长和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促成商业高利贷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促成自治城市的出现和海外豪商的进展，说明日本在畿内型庄园制的范围内，在中世纪庄园制解体后实现由农本向重商的过渡不是注定不可能的。

其次笔者进一步考察了能给畿内庄园最后一击的统一运动，是由畿外而畿内、由后进地区而先进地区的扩展，是力图强化农本经济的地方领主势力，占日本94%的耕地和人口的绝对优势，^①使畿内农民运动被镇压，使自治城市被取缔，使商人手工业者的自治组织被解散，再度强化了在畿内的封建统治，使畿内商品经济自由发展趋势的普遍逆转，畿内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转折遭受挫折。由此看来在反对封建庄园制的斗争中，如果只有农民运动，而没有在农业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没有与商品生产相结合的商人资本在经济、政治上的长足发展，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转折是不可能实现的。

最后，笔者肯定畿内庄园制解体中的进步趋势虽然由于畿外联合起来的地方领主的阻挠而中断，但也可能在社会经济方面某些畿内的积极因素被移植于畿外。似乎可以说在畿外领主联合政权的统治下，政治上是畿内政治畿外化；在经济方面，则有某些畿外经济畿内化的迹象。织田检地是在进驻京都以后才开始在各地检地中放弃惯行的贯高制而推行征收实物的石高制的。秀吉在检地中主张

^① 藤冈谦二郎：《日本历史地理总说》中世编，吉川弘文馆1977年版，第56页。

“一职支配”、年贡“直务”，实行“一地一作人”等原则，也可能与其对畿内均等名庄园经营管理的某些习惯的了解有关。统一政权借助先进地区的某些做法，排除小农与中央领主政权之间任何中间势力的存在。而在这种发展中，封建领主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入市场经济旋涡，其对此后日本社会近代化进程会发生积极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十五十六世纪日本畿内型庄园解体时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趋势虽受挫折，但非中断，故仍不失其为整个日本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大转折中的第一个回合。

在介绍《日本中世商品经济与寄进地型庄园制解体》一文之前，首先介绍日本畿内型庄园制的解体，并不是因为畿内型庄园最先解体。相反，它是在所有寄进地型庄园实际解体很久以后才开始解体的。提前介绍畿内型庄园解体，是想说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①说明它是以农业发达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的条件下，正沿着与西欧庄园制解体的大体相同的轨道走向解体的。只是后来由于全国广大地区的地方领主联合政权的包围和强制，才使其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转折受到挫折。所以，先介绍畿内型庄园解体，是想衬托出寄进地型庄园走向解体的非正常性。

在关于日本寄进地型庄园解体与商品经济的论文中，笔者首先关注的是有关寄进地型庄园的解体与商品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问题。应该说，大多数学者们主张的“政治斗争解体说”是正确的，因为此说完全符合日本寄进地型庄园在解体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西欧庄园是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开始解体的，而日本则相反，日本庄园制的解体恰恰是由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寄进地型庄园率先解体的。因为日本的寄进地型庄园是在土地国有制的班田制解体的过程中，在远离京畿的中间边远地区形成的。当时这些地区的地方实力派组织人力物力开垦荒废的公田、林野组成庄园。但由于在土地国有的体制下地方实力派虽可自行开垦荒地林野，但无

^①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5页。